

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郭素红

【摘要】《尚书》备述远古之政理,在经学的经世致用影响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等方面尤为特出。长期以来,受清儒贬抑明代经学之影响,明代《尚书》学研究并不充分。20世纪以降,通论性著作以旧说居多,对明代《尚书》学缺乏整体性关照;专题性研究则围绕《尚书》辨伪和敕修书,亦有单篇经解、科考等论题。一些研究注意到《尚书》经解中涉及时事的解读,提供给明代《尚书》学研究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今后的研究应从《尚书》具有的政治功用着眼,探求明代《尚书》经解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展现《尚书》学在明代社会中发挥影响的诸多层面。

【关键词】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反思;学术史

【作者简介】郭素红,北京联合大学文化话语与文化认同研究中心、师范学院(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2.6.198~207

【基金项目】北京联合大学科研项目“明代的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研究”(SK10202206)。

经学是基于五经元典形成的一门学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尚书》文辞佶屈聱牙,是“五经”中最为繁难的经典。唐刘知几《史通》有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①因《尚书》备述远古之政理,故在经学的经世致用影响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等方面尤为突出。

在经学史的传统研究中,明代经学多被贬抑,明代《尚书》学同样受到忽视,导致其研究很不充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对明学价值的重新评价,明代《尚书》学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本文拟综论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有关研究的学术史图景,在此基础上作出细致评论与反思,以期对未来《尚书》学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通论性研究中的明代《尚书》学

20世纪以来的经学史通论与《尚书》学专史均对明代《尚书》学有所涉及。虽然不同风格、不同指导思想经学史论述会影响到学者对明代《尚书》学的认知,但相关研究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共性。

(一)经学史中的明代《尚书》学

近代研究中国经学史的著作,首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和皮锡瑞《经学历史》二书。刘师培《经学教

科书》采用时段划分法,将传统经学分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和清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皆以专经的形式系统总结历代经学史的概况。刘师培治经学宗古文,考论群经及小学的著作颇多,他对明代《尚书》学的评价固然是从古文经学的学术角度,有意识地对明代《尚书》学的著作派别进行划分,但又不以古文经学的学术观点为限。清儒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之经说,刘师培则说“其可供参考之资者,亦颇不乏,是在择而用之耳”,认为宋、明说经之书“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论及明代《尚书》学的成果,刘师培肯定了马明衡、王樵、袁仁纠蔡《传》之讹,认为王夫之《书经稗疏》为最精。除褒扬梅鹗《尚书考异》考辨古文之伪的成就外,对黄道周《洪范明义》,则坦言“虽疏于考古,亦足为参考之资”。^②虽然只是论及明代《尚书》学大略,但其说精当,不囿于门户之见,已属难得。

皮锡瑞《经学历史》可谓经学之导言,亦以时间为序,将先秦至清代的经学分为十个时代,认为经学至明为积衰时代。除《经学历史》外,皮锡瑞还著有多种《尚书》学专书,如《书经通论》《今文尚书考证》《古文尚书疏证辩证》《尚书大传疏证》等,为近代研究《尚书》之大家。皮锡瑞《尚书》学著作皆著于今文

经学复盛之时,虽未有多大的创见,但对旧说的文献整理有功。皮氏是近代今文经学大师,故其阐释经学历史的演进过程必然以今文经学的门派立场,如援引顾炎武之说,感叹明代经学不及宋、元,但他对于明代《尚书》学,则指出“明梅鷟《尚书考异》辨古文之伪,多中肯綮,开阎若璩、惠栋之先”。皮锡瑞之说虽属粗陈梗概,但对明代《尚书》学在辨伪方面所持论尚属公允。

周予同在《经学历史》再版后记中指出:“将皮、刘两书加以对比阅读,或者对于了解经学史有些方便。”^③皮、刘二氏评价明代《尚书》学虽只是大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对明代《尚书》学的客观评价。陈延杰《经学概论》第廿一章就以“四书五经大全”为题,论述明代经学“实无所发明,诚不及宋元人远甚”“五经大全所因者皆元人遗书,其浅陋甚矣”,^④对明代《尚书》学的评价明显受到前人旧说的影响。

钱基博《经学通志》因感于《尚书》“西汉以来,诸儒有意复古,殷勤收拾,而作伪者出焉”,尤其关注《尚书》之辨伪。钱氏肯定“明儒有灼知梅氏《孔传》之伪而驳之者”,认为梅鷟《尚书考异》“指摘皆有依据”,但也批评梅著存在“旧采未周,考证尚疏”的问题。对于明代陈第的《尚书疏衍》,钱氏则认为“虽其初不由训诂入,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⑤不同于前人多贬抑之论。

江琨《新体经学讲义》之“宋元明之经学”、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之“经学的衰落”,李源澄《经学通论》之“论宋元明经学”,何耿镛《经学概说》之“明代经学——经学的衰落”、陈克明《中国的经学》之“元、明的经学”等,^⑥亦是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清儒有关经学方面的著述,认为有明一代为经学史上的衰落时期,亦是重述前人旧说。

以上经学史著作,对明代学术的评价普遍不高,或受到《四库全书总目》学术定见的影响,或因学风观点之不同,立说立论多据《四库全书总目》《经义考》等,除注意到《古文尚书》文献辨伪的成就以外,对明代诸多经学现象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原因等尚缺乏深入探讨。故其说虽不乏见解,亦颇为流行,却不足以真正全面展示明代《尚书》学。

20世纪以来的经学史研究,也有学者不浸染于

前人旧说评判,不只是记述描摹经学历史的发展演变轨迹,而是开始关注时代背景下的经学与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经济及教育等因素的关系,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量,更试图对其社会历史根源做出解释。

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即是此类较早的海外汉学家经学史名著。该书在作者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经学史的主线,宏观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经学史的概貌,微观上又对经学史上的重要经学事件、经学人物及著作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该书出版之后很快就有了中译本:江侠庵译本《经学史论》和孙俚工译本《中国经学史》。^⑦本田成之认为:“将今日的学问、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冶做一炉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就是经学。”^⑧该书对中国古代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做了总结性的回顾和展望,既不同于侧重于粗线条的经学简史,也不同于侧重于经学学者或经学派别为内容中心的考察方法,而是强调中国经学的内核为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为中国经学者别开研究新途径”。^⑨

对于明代经学,本田成之认识到宋元明时代的经学是理学化的经学,故该书对明代重要的理学家及其经学著作都做了介绍,并提出这一时期的经学“学问虽不进,但在实行方面,或出气节之士,或养成道德家”,并举方孝孺“杀身成仁”、吴与弼“谢人事”与胡敬斋、陈白沙“躬行践履”之学风。至王阳明心学兴起,“这种不立文学的直接简易之说,为蔑视学问的豪杰所喜是当然的,殆风靡一时”。本田成之对明代经学提要钩玄:“宋的学问,元继绍之,明只取其其中的几分实行之而已”,并加以总结评述,“要之,只是一种实践的精神修养法,最是有效,但学问上则内容甚是空疏”。^⑩因王学以《大学》作为尊德性所依据的经典之学,故有关明代《尚书》学的研究,除去梅鷟的《尚书》考辨著作,自然也就乏善可陈了。本田成之关于明代经学的论述虽失之简略,但也指出《四书五经大全》其后被唾弃,除去其自身内容价值的空疏之外,还在于清代取而代之的《御纂七经》和经学复古运动。

《支那经学史论》与此前的经学史著作有很大差异,明确指出经学对时代的作用,这种将经学与时代

背景密切关联的视角给国内学者以新的启发。但本田成之对经学史的中心问题,如经学演变关键的追索与经学现象、经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解释,又同于前人研究经学的方法,多未加介绍,也就谈不上经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批评问题了。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引晚明李维桢之说,将有明一代之书学划分为古义和时义,时义“皆便科举之文”,古义则有《书传会选》及其后直指、辑注、会通等数十家。对于梅鷟著《尚书考异》《尚书谱》考辩古文之伪,又陈第著《尚书疏衍》笃信古文,马氏则认为两家立说虽不同,但“信能别树矣”。马氏生于清代今古文学派相互消长之后,又接受近代西方的科学观念,所以他的经学史著作能够摆脱今古文学派的门户之见,论点趋于公正客观。马氏亦云明代经学“每况愈下,非无故矣”,^①虽指出明代经学之衰有因,但对经学之衰的追索与解释不够。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认为“经学之衰落,自有其因缘”,或因经学本身所发生之原因,或因经学以外环境的刺激。至于明代之经学,即是因北宋以后理学学风的转变,至明中叶又有王阳明心学,于是宋明两代乃以理学为学术之中心,“此则经学衰落之缘也”。故对于元明《尚书》学,蒋氏只论及“朱子、吴棫之疑《尚书》伪古文,近则为明人梅鷟之先声,远则为清儒阎若璩等嚆矢”。^②虽关注到明代经学学风的演变,但从经学史的角度对于明代《尚书》学的这一经学更新过程还缺乏深入的剖析。

章权才《宋明经学史》是一部专论宋明时期的经学断代史专著,与单纯的章节体叙事模式不同,从经学理论的确立来考察经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章氏认为,“宋明时期经学理论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跟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条件联系在一起”,^③在此观念指导下,章著试图论证初宋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旨在强化专制政体,至明中叶统治危机的加深造成心学的崛起,继而指出梅鷟《尚书考异》则是明中后期反对王学后学空疏学风的经学研究新成果。应当说,章著为突破“以经解经”或“以史解经”的经学史研究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但有关《尚书考异》的研究仅为尝鼎一脔,并不完备,难以反映明代《尚书》学的整体面貌。

叶国良等《经学通论》也认为明代《四书五经大

全》承继元人的经说,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因素,仅就朱学而论,《大全》已是宋代以来长期整理补充的结晶,并指出:“明人对清代经学有诱导之功的,主要在《易》《书》《诗》三经。”叶国良认为前人的某些论断,如明末清初学者对《四书五经大全》的指责,“大半是基于对宋学反感的心理”,^④虽关注到从宋学到清代朴学转折之际的历史因素,但并未对演变原因有深入探讨。

何耿镛《经学简史》之“元明经学”、许道勋等《经学志》之“学派界说之二:宋学系统”、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之“经学史诸专题”、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之“元明时期理学的衰微与心学的兴起”、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之“锐意革新的宋明经学”等经学史著作论及明代经学,大多以朱学王学为明代学术之中心,从理学到心学思想的传承脉络亦通过经学的形态展现出来,^⑤在这种凸显心性哲学的经学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是《周易》学和阐发理学躬行体认的《大学》《中庸》之学,明代《尚书》学无疑会受到忽视。

(二)《尚书》学史中的明代《尚书》学

20世纪以来的《尚书》学研究中也有一些通论性质的研究著作,这类著作的研究主题基本是清代以降《尚书》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依据新的编纂思路和体例设计写出新的论著,如从《尚书》概说介绍《尚书》学的基本知识入手,尤其关注《尚书》的今古文流衍、《古文尚书》的考证辨伪等重要主题。涉及明代《尚书》学的部分,大体就是梅鷟的《古文尚书》辨伪文献和刘三吾、胡广、王樵等少数经学人物及其著作或是概况性介绍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具体书目了。

张西堂《尚书引论》原为一部尚书研究讲义,整理出版的目的是如该书自序所言:“就是想将关于《尚书》的一些问题做一个详细而又比较扼要的叙述以供初学参考。”《尚书引论》选取近人的说法,对于《尚书》的名称、起源、编定、传本、篇目、真伪等等问题,逐一进行剖辨,对于有志于尚书之学的初学者不失为一部理想的入门指导书。因非《尚书》学通史著作,关于明代《尚书》学的内容仅在该书第六章“《尚书》的考证”部分,细说“梅鷟《尚书考异》之提出者”,对于古文《尚书》一案,后人多以为至阎氏而大白。张氏则认为“伪古文《尚书》一案,至梅氏已渐明”,^⑥

阎氏不过是将梅氏之说进一步推广罢了。

蒋善国《尚书综述》因有感于五经之中“惟有《尚书》纠纷最多”，力图综述学者对于《尚书》的整理和研究成果。蒋氏将《尚书》传世过程中的变动分为九个阶段，并将分歧主题分为《尚书》的名称篇数、《尚书》的整理、《尚书》的发见、《尚书》的传授、《尚书》的真伪和《尚书》的存亡等，然后围绕不同纠纷问题，以时间先后为序，综述历代学者对于《尚书》有关问题的意见并分别评析。因明代《尚书》学涉及的范围只在该书第五编“《尚书》的真伪”，故《尚书综述》只论及明代学者古文《尚书》的辨伪著作，并提出“比较能做深一步探讨的，只有梅鷟一人，他实际上是上承朱熹，下启阎若璩的唯一重要人物”，^⑩肯定了梅鷟在《尚书》辨伪史上的地位。

刘起釭《尚书学史》是一部研究历代《尚书》学的通史类著作，以时间先后为序，全面介绍了从《尚书》的形成到清代以降的研究。刘氏认为，元、明两代学术囿于宋学领域之内，故介绍明代《尚书》学的内容见于该书第七章“宋学对《尚书》学的发展与疑辨”之“宋学统治下的元明两代的《尚书》学”部分，认为元、明两代《尚书》学，主要只是有关蔡《传》的传衍问题和《古文尚书》之伪的进一步考辨。刘著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经义考》《书经传说汇纂》所载，考证出明代《尚书》学坛几乎全被蔡《传》拥护者和违异者两派占去，但真正学术价值最高的仍是明代的《尚书》学疑辨著作，并纵观梅鷟辨伪之作与以前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停留在文字难易的区分上，而是开始运用搜集证据的方法。一是备列文献的证据，一是备列历史的依据”。^⑪除此之外，《尚书学史》也分别评述明代拥蔡反蔡以外较重要的《尚书》学著作以及一般的以及倾向不明的《尚书》学著作、《禹贡》等单篇著作，并论及《古书世学》等明代伪《书》。刘著涉及的明代《尚书》学著作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谓宏富，是《尚书》学史中对于明代《尚书》学用力最勤的著作。

《尚书学史》将明代《尚书》学著作在学术思想上划分出拥蔡反蔡的不同倾向，据之进行“时义”和“古义”的分类，并关注到家学与经学的关系，指出专为科举制艺之法而撰的“时义”之作，后逐渐形成莆田和秀水二派地缘及师承关系。刘著虽注意到明代《尚书》学与科举官学的关系，但囿于以经学著作为

中心的考察方法，对于明代的政治、社会及《尚书》学者经学思想的关系尚缺乏关键的探讨。

陈柱《尚书论略》、吴康《尚书大纲》、陈梦家《尚书通论》、马雍《尚书史话》、李振兴《尚书流衍及大义探讨》皆为便于初学者入门的《尚书》学通论性著作，^⑫此类著作大多是针对《尚书》的诸多繁难问题，逐一梳理并研讨其来源和变迁，关于明代《尚书》学的内容大体仅涉及《古文尚书》辨伪问题，少有深入论述。

二、明代《尚书》学的专题性研究

20世纪以来对明代《尚书》学的研究，除上述通论性研究中的概述性介绍外，也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尤以对梅鷟《古文尚书》辨伪问题和敕修书的研究居多。

（一）梅鷟与《尚书考异》《尚书谱》

戴君仁在论及历代学者怀疑《古文尚书》之伪的脉络时，提出梅鷟是第一个以专著形式辨伪搜证，并逐一抉发《古文尚书》作伪之形迹的人。^⑬至其后80年代，傅兆宽对梅鷟的研究最为集中，先对梅鷟、郝敬考辨伪《古文尚书》方法的异同进行比较，探求梅、郝二家对清阎若璩等人辨伪思想的影响，又阐释证补梅鷟辨伪方法及著作，再分殊探究梅、阎二家的辨伪方法。^⑭傅著认为，梅鷟考辨《古文尚书》作伪的方法，对清代的阎若璩、惠栋等人颇有影响，故梅鷟是研究清代学术者必须提及的明代人物，《尚书谱》的重新刊行和价值重判，有利于重新评判梅鷟学术发展历程及学术成就。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明代考据学的论著，提出明人的考据工作是清代考据学的先导，奠定了明代经学的研究基础，对于明代经学史的价值重判提供了必要的学术依据。其中第三章考证梅鷟生平与考据学著作，从著者之动机与《尚书考异》之体例、辨《古文尚书》之伪、讥驳蔡沈《书集传》《尚书考异》之缺失等方面探讨梅鷟承宋吴域、朱子及元吴澄之说考辨《古文尚书》，分析梅鷟考据方法的利弊得失。^⑮林庆彰又从梅鷟《尚书谱》的体例以及论辨《古文尚书》之伪、梅鷟二书之比较等诸内容进行考证，认为《尚书考异》的举证加详于《尚书谱》，从而推断《尚书谱》的作书年代应早于《尚书考异》。许华峰的考证结论则与林氏不同，从梅鷟《尚

书谱》和《尚书考异》二书阐发辨疑的方式差异、二书序文所推及的稿本问题,推断《尚书谱》的成书时间应晚于《尚书考异》,提出《尚书谱》才是梅鹗辨伪的成熟之作。^②对梅鹗《尚书谱》的重新检讨,或不同于《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价值判断,增加了对梅鹗《尚书》辨伪著作的研究积累。

姜广辉对梅鹗《尚书考异》的考辨方法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梅鹗《尚书考异》虽逐一对《古文尚书》经文进行作伪举证,但考辨《古文尚书》的方法要点,并不在于尽核经文雷同之处,而是需要确立辨伪的逻辑基点,才能确证原创与抄袭。而后又专文探讨梅鹗《尚书谱》的成就与缺失,使《尚书谱》的价值重判更为明晰。^③也有一些研究在前人基础之上,或详述《尚书考异》的版本问题,或对《尚书考异》一书进行解读,或评析梅鹗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方法以及阐发《古文尚书》辨伪的理路。^④也有不同于前人结论的研究,如唐旭东从文献考据入手,认为梅鹗《古文尚书》辨伪所列证据及结论有误,存在曲解文献、淆乱概念、隐匿反面证据等诸多问题。^⑤

(二)《书传会选》与《书传大全》

《书传会选》和《五经大全》是明初敕修的两部重要典籍。蒋秋华考述明人对蔡沈《书集传》的批评,可以追溯自明太祖,《书传会选》即是太祖不满于蔡《传》之误而命刘三吾等敕修之书,《书传会选》的编撰则大体对蔡《传》持增补未备、考证得失的补正态度。^⑥一些研究者通过考证《书传会选》所取重引用的书籍,认为该书继承和总结宋元朱子学者的订误补正路向,但也指出虽是官修但实际影响有限。也有研究从明初《书传会选》的修纂,探讨太祖重新订立儒家经典的缘起、过程和实际影响,并考辨《书传会选》最为通行的四库本错误与纠谬并存的具体情形,解读《书传会选》经世倾向的表达方式的委婉是因明初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高度敏感和复杂性,认为《书传会选》刊行后的实际影响有限与修纂者的主观思想以及明初政治风气有关,^⑦对宏观层面的明代《尚书》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所揭示。

林庆彰重新检讨清人述及《五经大全》认为皆为“糟粕”之言,提出探讨《五经大全》的修纂,更有必要分析明初士大夫阶层的学术氛围和永乐年间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⑧其后陈恒嵩更详细考证《书传大

全》等编纂时所依据资料的来源,提出《大全》是对元人经说成果的编纂而非剽窃,^⑨此论亦不同于前人对《大全》的多所贬抑。还有研究则回到清代学者的学术视角,考证《五经大全》的取材问题、内容不实造成明代经学的衰微,或考证明成祖将《大全》修纂地点定于北京的政治、文化等多重影响因素,或认为《大全》的修撰目的,在于借统一儒家经典的形式,实现思想统一与文化传承,并对《大全》为明两百余年功令所尊之说进行考辨,认为其实际影响在颁布未久即日渐式微,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关注纂修者群体,提出《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互影响的产物,^⑩但并未论及明初士大夫群体参与政治实践的整体氛围。

(三)《尚书》单篇与个案经解

张兵《洪范诠释研究》以通论的形式,将《洪范》诠释以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为序加以阐释,认为明代汉文化的回归使蒙元统治时期一度衰败的《洪范》诠释得到复苏,并总结黄道周《洪范明义》凸显图、数化诠释的特点。^⑪张著虽对明代《洪范》学术背景有所解释,但对于明儒经解背后的深层意图尚探究不足。也有研究考述明末黄道周的《洪范明义》,认为该书具有汉宋兼采的学术精神和具民主精神的政治思想,或从错简和讹字两方面分析黄道周的考订特色,在于突出《洪范》的道德伦理和政教功能,或考证明代的“大礼仪”事件中,《洪范》经筵成为权力交接的标志,或考述明代《禹贡》学相关著作和主要经解观点,指出明代《禹贡》学诠释具有举业目的性倾向,对明代士大夫参与政治实践进行了客观描摹,并注意到明代中后期《尚书》经解中反映出的“经世致用”风潮。^⑫

20世纪以来对明代《尚书》学学者及专门个案经解的研究,除梅鹗之外不多。如从申时行对《尚书》的阐释探究其政治倾向与学术理念,从王樵《尚书日记》诸版本勘校提出对四库本《尚书日记》的重新认识,或通过《尚书日记》著述动机及解经特色考述王樵《尚书》学思想由诠释文本向关怀现实的转变,或从马明衡《尚书疑义》对蔡《书》析理不清之处的补充考证并探讨马氏“据诸于心”的解经方式,^⑬这些研究虽注意到《尚书》学经解涉及时事,契合明代学风思潮逐渐内转实务的趋向,但尚未理清解经者在政治

实践中对《尚书》的解读与应用。

(四)《尚书》学与科举

科举化经学著作是另类的治经成果。明代一经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地方世家专经传统的影响,逐渐形成科举地域专经的风潮,出现南直隶等地区的《尚书》肄习之风,这种《尚书》专经现象,又进而推动明代《尚书》学的发展。陈时龙梳理200余年的无锡科举与《尚书》专经选择,探讨明代科举地域专经的形成、维系与影响,提出科举地域专经的形成乃至治经之法逐渐占据主流,是基于前代经学的传统之上。^⑤这一研究对明代经学与经学教育、科举考试、地域社会、士人治学取向等的内在关联有所揭示,颇有意义。也有研究通过考述明清乡试出题主旨中治世经典的引用以《洪范》为最多,由此反映科举考试对《尚书》专经社会价值的重视,或针对金坛县世代主治《尚书》专经的传统,详细考述其以《尚书》为本经的科举成就和科举化经学著作对科举地域专经现象的反哺影响,^⑥为明代《尚书》地域专经的科举文化现象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素材。

(五)《尚书》学文献与训诂

通过搜辑考证各地方艺文志、各馆藏书目等典籍并分类解析,发现明代《尚书》学文献的数量颇多,并呈现地域性、科举化、商业性等特点。如果单纯着眼于文献数量,那么明代《尚书》学的发展可谓并不衰微。但明代经部御制文献多成书于洪武、永乐两朝,后代少有修订或新创之作,由此造成明代官方的经学思想陈陈相因、缺乏活力。朱熹经学官方地位的确立与明代科举的一经取士制度,都和明代御制经学文献的编撰关系密切,《尚书》类御制文献数量巨大,显示出明代帝王对《尚书》的偏好。现有研究集中于明代《尚书》训诂主题,基本呈现为或敷衍或疑辨蔡《传》或反不拘前儒的考据《书》训,^⑦对于明代学术转向与社会变动的关系虽有所考察,但尚未厘清明代《尚书》文献特点与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的关系。

三、对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研究成果的反思

以上勾勒出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大致轮廓。近年来,学者对明代学术问题的研究日见增多,虽皆有创获,但仍不足以真正展现明代《尚书》

学的全貌。这种局面正是学界有关明代经学研究总体情况的一个缩影,正如笔者多年前已指出的那样:“总的来说,明代经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如与汉、宋、清等时代经学的研究相比,明代经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不够多,未注意到的论题仍旧不少。经学论题多探讨一家之学术,对整个明代经学发展的脉落,则还未顾及。”^⑧

研究明代《尚书》学,不仅是为了梳理清楚明代经学而做的必要工作,也是更好地理解经学思想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关键一环。为此,既要从事《尚书》学自身的学术理路或内在逻辑出发,研究有明一代《尚书》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特色,做好明代《尚书》学的发展脉络、沿革传承、科举程序、疑经辨伪等专题研究,也应积极拓展明代《尚书》学研究相关文献作为必要的参照,用以呈现明代《尚书》学完整的研究图景,更应从《尚书》具有的政治功用价值,更为详实地阐释明代《尚书》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探求明代《尚书》经解与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关系,展现《尚书》学在明代社会中发挥影响的诸多层面。以下针对20世纪迄今明代《尚书》学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选择文献和社会历史两种视角,略作论述,对下一阶段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可能走向作一展望。

(一)明代《尚书》文献的全面调查与深入研究

无论是通论性研究还是专题研究,目前对明代《尚书》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个别学者的个别著作,如官修《书传大全》《书传会选》和梅鷟《尚书考异》等,其他著作尚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像《四库全书总目》中已著录的袁仁《尚书贬蔡编》、陈泰交《尚书注考》、朱升《尚书旁注》等书均少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另如明代重要学者吕柟的学术思想近来获得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其《尚书》专著虽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和《续修四库全书》,但迄未有专题研究。虽然学界瞩目的一些著作均为重要的明代《尚书》学文献,但由于样本量过低,实在不足以反映出明代《尚书》学的整体风貌。未来如需对明代《尚书》进行全面研究,势必不能因循既有研究路径,而应对包括专著、笔记、文集等体裁在内的明代《尚书》文献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

除专著之外,明人笔记文集集中的《尚书》学资料

更有待深入挖掘。不少学者并未形成《尚书》专著,但笔记与文集中却留有相关学术观点,这些资料对于全面了解明代的《尚书》学,进而了解这一时代的经学、文化思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应当引起珍视。笔记类如明儒罗钦顺《困知记》、徐问《读书札记》等均有《尚书》内容,文集则更多。保守估计,现存明人别集约3000种,学界通常易得者为《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的数百种,去明代别集全貌尚有不小差距。大量的明代别集收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中,利用不便,影响了其学术价值的发挥。但是,随着2013年以来《明别集丛刊》全五辑共500册和2019年《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240册的影印出版,这一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观。前者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明人别集为主,遴选所得约1800种;后者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诗文集稀见珍本353种。可以说,现存重要明人别集的主体部分已经影印出版,较为易得。明代别集的大规模出版,为明代文史研究提供一手资料,对包括明代《尚书》学在内的明代经学研究当有较大促进作用。目前学界已编有《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等断代文集资料索引,尤其清代相关工具书更为丰富,不但有《清人文集总目》《清代诗文集总目提要》等文集编目和索引工具书《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已经出版,更有陆续编纂完成、将要出版的《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编》和《清人文集经义总目》等成果。相较而言,明人文集所蕴含的学术文化信息还没有获得较好的揭示。已经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旨在汇集整理各种传世文献中的历代《尚书》学资料,并不专注于明代。未来如能像其他断代一样,展开对明代文集文献的全面排查工作,相信可以推动对明代《尚书》、经学乃至社会文化的了解走向更高层次。

(二)《尚书》与明代政治社会史的关系

如果说上述两点还属于学术内部视角,那么,着眼于《尚书》作为经学文本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社会功用,将《尚书》学与明代政治社会的发展相结合进行考察,来探求《尚书》学与明代“历史语境”的关系,则可以展现《尚书》学在明代社会发挥影响的诸多层

面,由此所能取得的学术成果,相信会比单纯的经学学术研究(囿于以经学著作为中心的考察方法)更为丰富。此前的研究,有一种淡化《尚书》作为经书的社会价值的取向,这与整个20世纪经学思想衰落的客观现实有关,如刘起釪《尚书学史》虽注意到明代《尚书》学与官学科举的关系,但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研究《大全》者,对明初士大夫群体参与政治实践的整体氛围的重视程度也不够,深入讨论仍有待后学。这种取向无疑不利于学界挖掘《尚书》在明代社会中的实际作用。今后的研究,亟需重视《尚书》“言其纪纲政事之施”^⑧的面向,仍有待将《尚书》作为“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⑨

明代《尚书》学的研究,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亦应有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有深刻关联的客观追索,将古典文献学的考据方法与历史文献学把握史料产生的“历史语境”意识相融合,为明代《尚书》学的研究能够深入到思想史层面做出新的积累。举例言之,前述吕柟不但有《尚书》著述,而且曾充会试考官,即主《尚书》,^⑩其《尚书》学修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特别是科举学风的变化,当有一定影响。而且,吕柟嘉靖中任翰林院修撰时曾充经筵讲官,给世宗讲《书·舜典》“夙夜惟寅”一句,恰逢朱元璋母亲仁祖淳皇后忌辰,吕柟“以《书》义相关,因口奏乞存忌辰,光圣孝,以纳进讲之言”,但却犯了嘉靖帝的忌讳。^⑪由此一事,即能看出《尚书》与明代时政的密切关系。而这并非孤例,在此前的武宗正德八年(1513),讲官何瑭进讲《尚书·益稷》,被认为其中含有讥刺时事的内容,引得正德帝大怒。^⑫经筵虽然不是非常贴近社会的政治活动,但由于是围绕皇权与儒学而展开,最能体现传统社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于此便可见明人的《尚书》研究绝非纯学术的探讨,而是与当时政治紧密关联。研究明代《尚书》学,离不开对当时政治社会关系的深入检讨。

引入地域史的视角,也对拓展经学研究的深度具有帮助。不同地域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学风,宋元以来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而有关明代经学的研究对此一研究模式的吸收尚有不足,仅有陈时龙结合地域史与科举史进行经学研究,提出了“地域专经”的概念,即指在明代科举体制

下,一些地域的读书人集中选择同一种经典来应试的学术史现象。未来随着此种个案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日益丰富,《尚书》学在明代历史中的具体展开才能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只有将《尚书》学安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明代《尚书》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明代《尚书》学本身。

四、结语

长期以来,受清儒贬抑明代经学之影响,明代《尚书》学研究并不充分。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的研究或作为经学史及相关著述的一部分,或作为某一主题的研究单元,或围绕某一论题,均取得一定成果,可作为未来研究的前导。不过,也应当承认,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中,经学史论述较多囿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定见,鲜有实质突破。《尚书》学通论性著作也以旧说视角居多,明代《尚书》学或见于宋元明单元且论题局限于《尚书》辨伪问题和敕修书,缺乏进一步整体性的关照;或将明代经学列于宋学系统,这种编纂方法凸显的是《周易》《大学》等经学哲学化的阐释,与《尚书》学则几乎无涉。专题研究中,以聚焦于《尚书》辨伪议题的研究成果最多,此外则多围绕明代《尚书》学著述、科考等主题。也有些研究注意到《尚书》经解中涉及时事的解读,对经解与社会政治、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内在关联略有涉及,提供给明代《尚书》学研究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但整体而言,还缺乏对《尚书》经解与政治互动的探求,将《尚书》作为与社会具有内在联系的研究对象的成果尚不多见。

《尚书》内容多为远古之政理,影响着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在经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上尤为特出。《尚书》作为经书,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有着紧密联系,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氛围尤其强化了这种联系。目前相关研究对此的重视程度尚不充分。未来如能着力发掘《尚书》学在明代的政治价值与社会功用,引入地域史视角来使明代《尚书》学的研究更加精细化,才有可能突破清代以来形成的学术定见,展现《尚书》学在明代社会中发挥影响的诸多层面,给予明代《尚书》学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近年来大量明代《尚书》文献的重新出版正为此提供了资料支持,值得认真调查研究,以期引导今后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所推进。

注释:

- ①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 ②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96页。
- ③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4、364页。
- ④陈延杰:《经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27、129页。
- ⑤钱基博:《经学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9、51、51、52、52页。
- ⑥江琬著,张京华点校:《新体经学讲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51页;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第204—215页;李源澄著,黄曙辉编校:《经学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46页;何耿镭:《经学概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123页;陈克明编著:《中国的经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1—94页。
- ⑦本田成之:《经学史论》,江侠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良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 ⑧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绪言”,第1页。
- ⑨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译者序”,第1页。
- ⑩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第235、236、234、237页。
- ⑪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5、135、134页。
- ⑫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18、19页。
- ⑬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 ⑭叶国良等:《经学通论》,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第589、583页。
- ⑮何耿镭编著:《经学简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3—225页;许道勋、徐洪兴撰:《经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2—219页;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0—76页;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2—468页;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7—1178页。
- ⑯张西堂:《尚书引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133、138页。
- ⑰蒋善国撰:《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2页。
- ⑱刘起釭:《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⑨陈柱：《尚书论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6—41页；吴康：《尚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49—59页；陈梦家：《尚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03—107页；马雍：《尚书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74页；李振兴：《尚书流衍及大义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第46—50页。

⑩戴君仁：《第一个搜集证据证明伪〈古文尚书〉的人——梅鷟》，《新时代》（台北）第1卷第2期，1961年2月。

⑪傅兆宽：《明梅鷟、郝敬〈尚书〉古文辨之异同》，博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明梅鷟、清阎若璩二家辨伪方法之研究》，《华冈文科学报》1988年第16期。

⑫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128—164页。

⑬林庆彰：《梅鷟〈尚书谱〉研究》，见氏著：《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181—212页；许华峰：《〈尚书谱〉、〈尚书考异〉成书先后的问题》，林庆彰：《经学研究论丛》第4辑，桃园：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第31—44页。

⑭姜广辉：《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⑮高原乐：《〈尚书考异〉版本比较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冯怡青：《梅鷟〈尚书考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刘光胜：《由怀疑到证实：由宋至清抉发〈古文尚书〉伪迹的理路》，《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⑯唐旭东：《梅鷟〈古文尚书〉辨伪驳议》，谢飘云等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论丛》，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26—129页。

⑰蒋秋华：《明人对蔡沈〈书集传〉的批评初探》，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269—294页。

⑱朱玉霞：《〈书传会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8年；《〈书传会选〉四库本考辨》，《昆明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书传会选〉之经世倾向》，《安康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王笃堃：《学术与政治的交织——明初〈书传会选〉的纂修及其影响》，《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3期。

⑲林庆彰：《〈五经大全〉之修纂及其相关问题探究》，见氏著：《明代经学研究论集》，第33—60页。

⑳陈恒嵩：《〈书传大全〉取材来源探究》，见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95—316页；《〈五经大全〉纂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吴大学，1998年；《〈五经大全〉纂修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67—256页。

㉑姜海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遗产》，《五邑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李康范：《明代〈五经大全〉的

纂修背景及经学史意义》，见《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2013年7月，第59—70页；朱冶：《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南都学坛》2015年第6期；侯美珍：《明科场由尊〈大全〉到不读〈大全〉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李晓明：《明初〈五经大全〉传注取材新探——兼论纂修群体构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㉒张兵：《〈洪范〉诠释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52—181页。

㉓翟奎凤、邱振华：《以易解范，汉宋交融——黄道周〈洪范明义〉思想研究》，《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许卉：《黄道周对〈洪范〉文本的考订析论》，《闽台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廖峰：《〈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仪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贵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王荣煜：《明代〈禹贡〉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9年。

㉔参见陈敏：《申时行及其〈书经讲义会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年；王笃堃：《〈尚书日记〉十年本学术价值刍议》，《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王樵〈尚书日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17年；《〈尚书日记〉四库本讹误考辨》，《常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尚书日记〉版本流变考》，《常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何柳惠：《马明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9年。

㉕陈时龙：《明代无锡的科举与〈尚书〉经》，《明清论丛》2016年第1期；《明代的科举与经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32—345页。

㉖龙朔：《明清乡试〈尚书〉义出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9年；王笃堃：《科举、家族与著述：明代南直隶金坛县〈尚书〉专经研究》，《教育与考试》2020年第1期。

㉗李霞：《明代〈尚书〉学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黄首禄：《明代御制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14年；陈彤：《明代〈尚书〉训诂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20年。

㉘郭素红：《明代经学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第3页。

㉙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

㉚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㉛马理：《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先生墓志铭》，吕柟：《泾野子内篇》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2页。

㉜《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嘉靖元年四月戊戌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65页。

㉝马理：《大明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柏斋何先生神道碑铭》，见王永宽点校：《何塘集》附录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8—453页。